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3.06.003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期间毛泽东等领导人 应对国际舆论的决策

谢忠,张佳雨

(湖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期间,毛泽东等领导人应对国际舆论的决策是其政治军事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于以打促谈、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既定目标,为取得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其中,始终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印边界冲突的政策引导了国际舆论走向,有理有力有节的外交宣传攻势壮大了支持中国的国际舆论声势,主动停火后撤的决策及实际行动扭转了国际舆论局势。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期间毛泽东等领导人应对国际舆论的政治智慧和高超斗争艺术,对当今复杂国际环境下有效地开展国际舆论斗争、塑造客观公正的中国形象、坚决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毛泽东等领导人;国际舆论

中图分类号:D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3)06-0017-07

中印边界问题是英国殖民统治印度时期侵略中国所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从中印正式建交至1959年前,“印中人民是兄弟”一直是两国关系的主流。但由于独立后的印度企图全面继承英国殖民者的“权益”,对边界问题进行单边曲解、主观臆测和错误解读,导致中印边界问题从纠纷走向冲突,最终酿成了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

作为两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之间的边界战争,中印边界战争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持续关注,但是,以往的研究成果大都集中在军事、政治、外交和经验教训等方面,很少关注舆论问题,更缺少关于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期间毛泽东等领导人应对国际舆论的专题论著。就国内而言,研究主

要集中在边界冲突与中国政府的决策、中印边界战争与中印关系之间的联系、中印边界冲突与冷战关系等方面^①。目前,从国际舆论角度来研究中印边界战争的仅有一篇硕士学位论文^②。该文只是从各国媒体报道角度分析了中印边界争端的发展及后续影响,没有说明中国政府与各国媒体的互动关系,特别是没有涉及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期间毛泽东等领导人应对各国媒体的决策。但我们应看到,应对国际媒体只是应对国际舆论的手段之一,而不是全部手段。就国外而言,自1960年代初期以来,印度和欧美国家的学者对中印边界战争的起因、过程、影响、责任及中国速战速胜的原因、中国单方面无条件撤军的原因、中印

收稿日期:2023-06-3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1BDJ059)

作者简介:谢忠(1968—),女,湖南宁乡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①参见黄想平,齐鹏飞:《浅析中国政府在中印边界争端中的危机处理》,《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1期;廖心文:《处理中印边界问题的对策方法——老一辈革命家与边界问题研究之三》,《党的文献》2013年第6期;张岚岚,魏代强:《1962年中印之战中央军委的战略运筹与应对》,《当代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1期;许可人:《毛泽东处理中印边界问题决策的历史启示》,《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康民军:《试析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印关系恶化的原因——中印边界战争40周年回顾》,《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戴超武:《关于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和中苏分裂研究的若干问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4期;孟庆龙:《中印边界战争前后美国对印度态度的变化——兼论美印关系的历史基础》,《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②李漪:《浅析国际媒体对1959—1962年中印边界争端态度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

边界战争的可避免性等问题进行了研究^①,但也并没有从国际舆论角度探讨中印边界战争的论著。本文以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相关著作和历史文献为依据,借助中国外交部档案以及《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文章,系统分析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期间毛泽东等领导人应对国际舆论的决策。

一 引导国际舆论走向的和平谈判政策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9年中印边界争议公开前,国际舆论很少关注中印边界问题。1959年中印边界争端公开,特别是朗久事件和空喀山口事件发生后,印度政府罔顾事实,用最恶劣的语言对中国进行诬蔑、谩骂和指责,说中国“蓄意侵略印度领土”^②,造成了明白的侵略事件。印度媒体也大肆渲染“中国侵略成性”“比西方帝国主义更糟”^③。如此污名化的宣传不仅使国际舆论对中印边界问题的关注与日俱增,而且导致1959年国际上掀起了反华浪潮。此时,国际舆论普遍偏袒印度,美国、英国、新加坡、马来亚(今马来西亚)、锡兰等多国媒体争相在西藏问题和边界武装冲突事件上斥责、诬蔑中国,只有朝鲜、蒙古、柬埔寨等少数国家媒体表示了对中国的支持和同情^④,连苏联也在1959年9月9日公开发表表面中立、实则偏袒印度的塔斯社声明^⑤。面对如此不利境地,毛泽东等领导人已意识到,我们处于十分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如再次发生中印边界冲突,中国将在国际上陷入孤立,因而在对国际敌对势力予以坚决反击的同时,必须尽最大的善意和诚意争取国际舆论的理解和支持。

自边界武装冲突发生以来,毛泽东等领导人

对印度的“前进政策”一直保持着忍让和克制,始终坚持通过和谈解决中印边界争端,且为此不懈努力。在边界武装冲突爆发后的三年里,“几乎所有谈判的建议都是中国方面主动提出的”^⑥。1959年5月14日,在修改中国外交部致印度外交部的一份答复中,毛泽东写道:“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⑦他的这一表述为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定下了基调。朗久事件和空喀山口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讨论决定,由周恩来于1959年11月7日代表中国政府致信尼赫鲁,建议两国武装部队沿东、西段双方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并停止巡逻;两国总理最近举行会谈^⑧。印度尼西亚、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国报纸刊载了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并发表评论说,中国政府的建议说明了中国在处理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容忍和诚意^⑨。尽管印度政府拒绝了上述建议,但印度政界人士、美国合众社却不得不承认周恩来的信件比以前的信件富有和解精神^⑩。

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争端,中央决定由周恩来于1960年4月亲赴新德里与尼赫鲁举行会谈。尽管因印度立场强硬,谈判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但是从国际舆论角度看,还是有所收获的。中国政府在谈判期间表现出的巨大诚意,中国军队单方面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并停止巡逻的善意行动,以及同期中国与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等邻国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重大进展,促使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从“中国侵略”转移到中印双方会谈的态度上。一些国家的媒体开始认识到“中国侵略印度”的虚假性和印度在中印边界冲突中的责任。如,曾在中印边界冲突中一直斥责中国的锡兰《前进》周刊发文称:“缅甸和中国能够达成这样一个全面的圆满的边界协议,为

①参见内维尔·马克思韦尔:《印度对华战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1年版;古普塔:《中印边界秘史》,王宏伟、王至亭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版;Neville Maxwell,“China's India War:How the Chinese Saw the 1962 Conflict”,<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11/08/02/china-s-india-war-how-the-chinese-saw-the-1962-conflict/>。

②《中国和印度关于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中印边界问题和其他问题往来文件汇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1960年版,第401页。

③王宏伟:《当代中印关系述评》,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页。

④李漪:《浅析国际媒体对1959—1962年中印边界争端态度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

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7页。

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9集)(1962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版,第150页。

⑦《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页。

⑧《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66页。

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5页。

⑩《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5—236页。

什么印度和中国不能呢?显然过错不在中国。”^①

从1962年初开始,印度在中印边境地区不断以武力大肆蚕食中国领土。中共中央一方面指导边防部队开展有理有节的反蚕食斗争,另一方面仍尽一切可能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7月23日,周恩来致电正在日内瓦参会的陈毅,请他约见印度国防部长梅农,争取发表一个恢复中印边界谈判的公报或消息^②。但是,印度政府不仅未对中国倡议作出回应,而且挑衅和入侵活动更加猖獗。为避免边界局势进一步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中国外交部于8月4日、9月13日、10月3日先后三次照会印度驻华使馆,建议中印就边界问题举行不附加任何先决条件的谈判,但印度政府却顽固坚持中印边界早已划定,三次拒绝谈判。对此,印度尼西亚《人民日报》、瑞典《新日报》、缅甸《人民报》和《加拿大论坛报》等都发文谴责印度^③。连英国《泰晤士报》也评论说,印度“未能使对方关闭谈判的大门”^④。

面对印度军队发动的全面进攻,1962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自卫反击决策。即便如此,在中共中央看来,中国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也是立足于以打促谈,目的是将印度拉回到谈判桌前。因此,中国政府于10月24日发表声明,提出恢复和平谈判、停止边境冲突、两国总理会谈等三项建议。声明发表后,中国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有了明显改善。据统计,在有媒体报道中印边界战争的20个国家中,同情和支持印度的有10个国家媒体,有5个国家的媒体对中国表示了支持,还有5个国家的媒体刊登了大体中立的文章^⑤;英国《东方世界》《每日电讯报》等报纸也刊登了客观评价中国的文章^⑥。

中共中央之所以始终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印边界争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因素。就历史背景而言,中印边界问题是英国殖民统治印度时期侵略中国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而独立后的印度试图全盘继承英国的殖民遗产,使边界问

题变得更加棘手、复杂,只能通过双方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就国家利益而言,通过谈判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符合当时中国外交的战略重点和国家利益的主要目标。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外交在此时的主要任务应当是营造一个有利于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周边安全环境;中国外交的战略重点与斗争方向在东方,而不在印度……因此,中国政府应该力争与印度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⑦就国际环境而言,当时中国既要面对美国的持续敌视政策和中苏关系恶化带来的巨大压力,又要面对周边国家的质疑、排斥,可谓四面受敌,而奉行不结盟外交政策的印度不仅得到苏联、美国等大国的支持,而且得到广大亚非国家的追捧。因此,在国际舆论场中,印度通常是被偏袒、同情和支持的一方,而中国则多是被诬蔑和漫骂的一方。

由上可见,在中印边界问题由冲突到战争的过程中,毛泽东等领导人始终高举和谈的旗帜,并为此作出了不懈努力,最终实现了边界迅速停火且逐步走向和谈的目标。这种一以贯之的和谈政策不仅为中印边界问题公平合理解决找到了有效办法,而且也得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对推动国际舆论逐渐支持中国发挥了引导作用。历史证明,自1959年中印边界争端公开后,国际舆论对中国的支持一直呈逐步上升的态势,在1962年中国政府宣布主动停火后撤之后更是达到了最高点。

二 壮大支持中国国际舆论声势的外交、宣传攻势

在作出自卫反击决策前,毛泽东曾估计,一旦我们自卫反击,有可能被孤立。与毛泽东的估计相同,自卫反击战开始后,印度政客和媒体大肆诬蔑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是“赤裸裸侵略”,把中国说成印度的“头号敌人”,叫嚷同中国“断绝一切外

①《锡兰“前进”周刊评中缅协定时指出:中印边界问题未解决过错不在中国》,《参考消息》1960年2月9日。

②金冲及:《周恩来传(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6页。

③《印度尼西亚人民日报、瑞典新日报、缅甸人民报和加拿大论坛报,谴责印度拒绝中印边界谈判》,《人民日报》1962年10月23日。

④《英〈泰晤士报〉评中印边界问题,印度拒绝会谈并采取军事行动》,《人民日报》1962年10月11日。

⑤李漪:《浅析国际媒体对1959—1962年中印边界争端态度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

⑥《英国公众舆论主张谈判解决中印边界争端〈东方世界〉说中国一再努力恢复谈判》,《人民日报》1962年10月30日;《英报说印政府挑起边境冲突自食恶果,印度军费开支加深经济困难》,《人民日报》1962年11月5日。

⑦雷英夫口述,陈先义执笔:《在最高统帅部当参谋:雷英夫将军回忆录》,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04页。

交关系”,并把印度军队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全面进攻说成是“保卫国家自由”。此时,国际舆论对印度表示同情者占了多数。美国赤裸裸地支持印度,英国等西方国家都同情和支持印度,苏联表面“中立”实则支持印度,亚非大部分民族主义国家也指责中国对印度的“无端入侵”是所谓奉行“沙文主义的、好战的外交政策”^①。为改变这种不利局面,毛泽东等领导人通过多方外交、宣传攻势,使国际社会知晓中印边界问题真相,最大限度地争取国际舆论支持,壮大了支持中国的国际舆论声势。

一是开展对印照会战。据笔者统计,从1961年12月至1962年9月,中国政府就中印边界问题给印度政府的照会、备忘录等共计35件。如,1962年2月至6月,中国政府先后五次照会印度政府,指出印方用武力改变边界现状的做法是危险的,要求印方停止武装挑衅、撤出侵略据点和入侵军队。又如,随着印军的步步进逼,中国政府于1962年7月和10月共十次就印度军队不断入侵中国领土提出严重抗议、严厉警告。尽管印度政府对这些抗议和警告置若罔闻,但我们仍努力向国际社会说明了印军入侵中国领土的真相。11月6日,外交部照会印度驻华大使,要求印度积极响应中国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虽然尼赫鲁迅速拒绝了中方建议,但使国际社会更加看清了中国政府的诚意。

二是力争亚非国家的支持。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开始后,周恩来于10月下旬接见阿联、缅甸两国驻华大使,向他们阐明事件真相,表达中国立场^②,随后又致电几内亚、坦噶尼喀、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领导人,向他们对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所表示的热心和关切表示感谢^③。为了进一步向亚非国家说明真相,经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于11月15日就中印边界问题致信25个亚非国家

领导人,并抄送83个国家领导人,呼吁他们“主持公道”^④。另外,中国政府积极响应由锡兰等六个亚非国家组织的旨在促进中印和解的科伦坡六国会议。1963年1月5日,毛泽东还亲自接见来访的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这对争取世界舆论理解和支持中国无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三是争取苏联的支持。考虑到中苏同盟关系,中国在对印自卫反击战前夕曾向苏联表明中方的立场,试图获得苏联的支持。1962年10月8日,周恩来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年科时说,印度可能在中印边境东段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而中国一直保持忍耐克制态度,但印度决意要进攻,中国就坚决自卫^⑤,但苏联反应冷淡。10月16日至28日古巴导弹危机爆发,苏联为寻求中国的帮助以度过危机,暂时改变了其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中立”态度,转而支持中国面对印度的侵略行为时进行自卫^⑥。中共中央十分注意把握这一时机,认为争取苏联即使是暂时的支持,也能扩大国际舆论的影响。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爆发当天,赫鲁晓夫立即致信尼赫鲁,对印度企图以武力解决同中国边界争端的报道表示关切,并警告说:“这是一条十分危险的道路。”^⑦10月24日,中国提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苏联《真理报》即于25日发表社论表示,“中国政府的建议是建设性的”,“声名狼藉的‘麦克马洪线’从来未被中国承认过”^⑧。

四是争取国际著名人士的理解。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英国出于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考量,在中印边界战争问题上较少明确支持印度^⑨。因此,中国政府在对待英国著名人士问题上尽可能地做工作。1962年10月,周恩来两次接见前英国工党议员麦克唐纳,指出在中印边界问题上,英国政府应当根据事实讲话^⑩。11月,周恩来两次复信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希望他

①李漪缤:《浅析国际媒体对1959—1962年中印边界争端态度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

②《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505—507页。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9集)(1962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版,第131—134页。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9集)(1962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版,第151页。

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502页。

⑥《苏共领导联印反华的真相》,《人民日报》1963年11月2日。

⑦内维尔·马克思韦尔:《印度对华战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1年版,第409页。

⑧《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支持我国政府声明》,《人民日报》1962年10月26日。

⑨孟庆龙:《中印边界冲突中的英国因素》,《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⑩《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508页。

运用其卓越影响,推动印度积极响应中国政府声明^①。经过中国政府不懈努力,在中印边界战争期间,英国《每日电讯报》《东方世界》《每日快报》等媒体有时也发出对中国客观评价的声音^②。

五是揭露尼赫鲁“不结盟”政策的虚伪。中印边界战争爆发后,印度全面启动战争机器,撕下“不结盟”的伪装,不断叫嚣要同中国长期作战。中方在掌握尼赫鲁政府向美国等西方国家请求援助事实的基础上,决定揭露尼赫鲁所标榜的“不结盟”政策的虚伪。为此,《人民日报》刊发了大量文章报道印度求援的事实,如:尼赫鲁于1962年11月19日向美国总统肯尼迪提交了一封乞求军事援助的信^③;他还致信麦克米伦政府,提出英国援助更多军事装备的请求^④;在中国发表中印边界全线主动停火后撤的声明后,美国向印度派出了以艾夫里尔·哈里曼为首的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高级顾问代表团,英国则派出了以桑迪斯为首的英国政府代表团^⑤;在美英代表团军事人员的协助下,印度加紧扩军备战,准备把陆军兵力扩大到二百万人^⑥;苏联也将分批向印提供米格飞机^⑦;等等。一些国际媒体在了解了真相后,纷纷批评尼赫鲁的“不结盟”政策,如:印度尼西亚《社会使者报》揭露印度政府口头上不结盟,实际上结盟^⑧;美国《芝加哥太阳时报》刊文称,美英两国同印度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军事同盟^⑨。

综上所述,毛泽东等领导人通过开展对印外交照会战、积极争取亚非国家及国际著名人士的理解支持、把握时机争取苏联的支持、充分揭露尼赫鲁“不结盟”政策的虚伪等有理有力有节的外交宣传攻势,塑造出爱好和平正义的中国形象。这些努力起到了壮大支持中国国际舆论声势、削

弱支持印度声音的良好效果。

三 扭转国际舆论局势的停火后撤决策

关于停战谈判的声明发表后,中国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有了改善,但支持中国的国家仍是少数。据中国外交部档案记载,亚洲国家中仅有朝鲜、缅甸、巴基斯坦和越南公开表示支持中国,非洲国家中只有阿尔及利亚、几内亚和加纳支持中国。相比之下,支持印度的国家占大多数。据印度外交部1962年11月9日统计,“同情和支持”印度的国家有40个,“同情和关切”印度的国家有5个,“同情”印度的国家有11个,即站在印度一边的国家共有56个^⑩。

为了争取国际舆论,1962年11月15日,周恩来在致亚非国家领导人信中强调:“只要还有一线希望,中国政府将继续寻求和解的途径。”^⑪这一表态为接下来中共中央作出主动停火后撤决策作了某种程度的暗示。18日,在一些国家领导人和国际媒体要求中印谈判的呼声下,此前始终坚持边界问题不容谈判僵硬立场的尼赫鲁,声称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中印分歧。毛泽东认为,印度“突然大谈和平解决”^⑫,意在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遂决定先发制人。20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等研究决定:中国边防部队全线主动停火后撤。21日零时,中国政府宣布:中国边防部队从22日零时起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后撤。同一天,毛泽东同周恩来商定,由周恩来约集外事办公室、外交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人民日报社有关人员开会,讨论在这次中印边境斗争的胜利中如何扩大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9集)(1962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版,第153页,第163—164页。

②参见《英国一些报纸认为是印度拒绝中印谈判,发动进攻》,《人民日报》1962年10月14日;《英国公众舆论主张谈判解决中印边界争端〈东方世界〉说中国一再努力恢复谈判》,《人民日报》1962年10月30日;《〈每日快报〉哀叹尼赫鲁的声望江河日下》,《人民日报》1962年11月29日。

③《尼赫鲁致函肯尼迪乞求更多军援》,《人民日报》1962年11月21日。

④刘恒:《中印边界冲突背景下英国对印度国防建设的援助(1962—1963)》,《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⑤《美英两国代表团不断相互“交换意见”协调行动》,《人民日报》1962年11月27日。

⑥《在美英代表团军事人员策划下,印政府准备扩军到二百万人》,《人民日报》1962年11月30日。

⑦《尼赫鲁在印人民院说,苏将分批向印提供米格飞机》,《人民日报》1962年12月6日。

⑧《印度尼西亚报纸揭露印度依靠美国继续备战印政府口头上不结盟实际上结盟》,《人民日报》1962年11月28日。

⑨《美报说印政府的所谓不结盟是幌子》,《人民日报》1962年12月14日。

⑩孟庆龙:《从印度的心态看洞朗事件》,《边界与海洋研究》2017年第5期。

⑪《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9集)(1962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版,第151页。

⑫《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57页。

影响的问题^①。这表明,毛泽东在作出主动停火后撤决策的同时,就考虑了由开展国际舆论斗争的相关部门共同参与,一致行动,以争取国际舆论朝着更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转变。

中国政府采取主动停火后撤的重大和解步骤,“使全世界人民看得更清楚,谁爱好和平,谁要战争”^②。从此,中国站在了国际舆论道德制高点上,赢得了世界舆论的广泛赞誉和支持。一些国家报刊、领导人纷纷发表社论、评论、谈话,盛赞中国政府声明表现的道义立场、道义原则和道义举动。巴基斯坦《战斗报》社论说,中国军队在马上要使自己的敌人遭到粉碎性失败的时候主动停火后撤,证明中国领袖们坚持高尚的政治原则和正派的道义价值^③。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致函周恩来,表示中国政府的声明“应当被作为一个慷慨的行为而普遍予以欢迎”^④。就连习惯于抹黑诋毁中国的西方媒体,也不得不称赞中国的主动停火撤军行动。法新社评论说,中国“不愿意继续打一场即使是胜利的仗”^⑤。停火后撤声明发布后,中国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迅速好转。据统计,在中国宣布单方面停火后撤后短短7天时间里,有37个国家宣布支持中国,这些国家中有14个是在战争开始后曾宣布支持、同情和关切印度的国家^⑥。

为了实现停火后撤的目标,中国政府持续作出了最真诚的努力:1962年11月30日和12月8日、21日、30日,国防部发言人4次就中国边防部队从中印边界全线主动后撤发表声明,说明我军后撤进程及路线;1963年5月25日,中国边防部队奉命主动完成交还缴获的印军物资、从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印军等行动。中国政府的这一系列行动表明:“我们

是为正义而战不是为改变现状而战。”^⑦

道义自在人心。随着主动停火后撤决策的落实,中国面临的不利国际舆论环境迅速得到扭转,而印度却遭到越来越多曾经相信并支持它的国家的质疑。西方国家和印度的报刊公开承认印度政府处境孤立。《纽约时报》发文称:“亚洲和非洲的中立主义者未能给予印度道义上的或外交方面的支持。”^⑧《星期日电讯报》评论说:“亚非不结盟的信徒们似乎是在中国一边,而不是在印度一边。”^⑨西德《法兰克福报》发文称,整个不结盟集团抛弃了印度^⑩。印度外交部国务部长梅农夫人愤然说,除马来亚以外,亚洲国家里没有一个“有勇气和信心”谴责中国^⑪。据英国外交部档案统计,到1963年1月7日,不公开亲印的只有突尼斯、象牙海岸等9个国家,公开亲印的只有埃塞俄比亚和刚果2个^⑫。

总之,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期间,毛泽东等领导人高举道义旗帜,以真诚态度和实际行动主动实现停火后撤,使印度政府不得不接受边界停火的现实。这一系列举措增强了我国对印自卫反击战的正义性,使我国抢占了国际舆论的制高点,赢得了国际舆论的广泛赞誉和支持,迅速扭转了国际舆论局势,也体现了毛泽东在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期间应对国际舆论的政治智慧和高超斗争艺术。

结语

舆论战是一种针对公众舆论的战争策略。随着高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舆论战已经成为赢得战争主动权的重要手段。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期间,面对某些国家政府、政客、媒体对中

①《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0页。

②《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59页。

③《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61页。

④《罗素说中国政府声明应当被作为一个慷慨行为而普遍予以欢迎》,《人民日报》1962年11月22日。

⑤《法国通讯社和报纸评论我国声明,中国不愿对印打一场即使是胜利的仗》,《人民日报》1962年11月24日。

⑥孟庆龙:《从印度的心态看洞朗事件》,《边界与海洋研究》2017年第5期。

⑦《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75页。

⑧《〈纽约时报〉攻击亚非国家不支持印政府》,《人民日报》1962年11月29日。

⑨《美英报刊承认印政府处境孤立〈纽约时报〉攻击亚非国家不支持印政府〈每日快报〉哀叹尼赫鲁的声望江河日下》,《人民日报》1962年11月29日。

⑩《印美资产阶级报纸和通讯社承认,印度态度无理在亚非国家中自陷孤立,五十个亚非国家中只有两个支持印度,尼赫鲁大失所望》,《人民日报》1962年12月3日。

⑪《梅农夫人对印孤立极感恼怒,诬蔑我国倡议并对亚洲国家滥施攻击》,《人民日报》1962年12月2日。

⑫孟庆龙:《从印度的心态看洞朗事件》,《边界与海洋研究》2017年第5期。

国的污名化宣传或误解误读,为改变我国面临的不利国际舆论环境,毛泽东等领导人作出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印边界冲突、开展有理有力有节的多方外交和宣传攻势、主动停火后撤三大决策。这些决策分别起到了引导国际舆论走向、壮大支持中国的国际舆论声势、最终扭转国际舆论局势的良好效果,为取得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胜利提

供了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研究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期间毛泽东等领导人应对国际舆论的决策,不仅能更好理解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演进历程,认识到国际舆论的重要性,而且对在当今复杂国际环境下更好地开展国际舆论斗争、塑造客观公正的中国形象,坚决维护我国领土主权安全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Mao Zedong and Other Leaders' Decision-making of Dealing with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s During the Sino-Indian Border Self-defense Counterattack War

XIE Zhong & ZHANG Jiayu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Sino-Indian border self-defense counterattack, the decision-making of Mao Zedong and other leaders' collective leadership in response to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s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warfare, which obeyed and served the established goal of promoting talks and peacefully solving Sino-Indian border issues. It also provided a favorably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environment for the victory of Sino-Indian border self-defense counterattack. Among them, the policy of insisting on solving the border conflicts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through peaceful negotiations guided the trend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s, the rational and powerful diplomatic offensive strengthened the momentum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s supporting China, the decision-making and practical actions of taking the initiative to cease fire and retreat reversed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s. During the Sino-Indian border self-defense counterattack, the political wisdom and superb fighting art of Mao Zedong and other leaders in response to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are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effectively carrying out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struggle, building an objective and fair image of China, and resolutely safeguarding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in today's complex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Key words: Sino-Indian border self-defense counterattack; Mao Zedong and other leaders;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责任校对 王小飞)